

周恩来传

(四)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主编 金冲及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恩来传/金冲及主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版.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2 (2015.2重印)

ISBN 978-7-5073-2467-9

I. ①周… II. ①金…②中… III. 周恩来 (1898~1976) —传记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14390号

周恩来传

编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主编: 金冲及

责任编辑: 边彦军 杨茂荣

责任印制: 寇炫

出版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

邮编: 100017

网址: www.zywxpress.com

电子邮箱: zywx5073@126.com

销售热线: 010-63097018、66183303

经销: 新华书店

排版: 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680×960mm 16开 123印张 1520千字

2008年3月第2版 2015年2月第7次印刷

印数 25601-30600套

ISBN 978-7-5073-2467-9 定价: 138.00元 (全4卷)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卷目录

- 五十七、从严重经济困难中走出来(上) (1423)
- 五十八、从严重经济困难中走出来(下) (1456)
- 五十九、中印边界第二次武装冲突 (1494)
- 六十、出访亚非欧十四国 (1529)
- 六十一、领导发展核事业 (1569)
- 六十二、在备战形势下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 (1595)
- 六十三、北方抗旱和邢台地震 (1632)
- 六十四、“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 (1653)
- 六十五、“红卫兵运动”中(上) (1671)
- 六十六、“红卫兵运动”中(下) (1693)
- 六十七、一九六七:大动荡的一年 (1717)
- 六十八、九大前后 (1744)
- 六十九、庐山会议与林彪事件 (1775)
- 七十、批判极左思潮 (1806)
- 七十一、打开外交新局面 (1835)
- 七十二、四届人大“组阁”之争 (1873)
- 七十三、最后的日子 (1906)
- 后记 (1944)

五十七、从严重经济困难中 走出来(上)

经历了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连续两年的严重困难，特别是原来没有预计到的严重粮食危机，周恩来深深感到，作为中国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还远远谈不上过关，这个基础还十分脆弱。他在一次工作汇报会上指出：“不大跃进，不能摆脱落后。但是，我们对大跃进的规模还未摸透，我们对农业过关估计容易了。”^①

怎样才叫“农业过关”呢？周恩来在另一次会上是这样解释的：“至少农业的主要粮食，在全国每人平均达到一千到一千五百斤中间才能算过关。”“农业过关总要使农业能够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有一定数量的化肥配合土肥来增产，基本上完成水利”，“这都是基本上的要求，要基本上实现”。“我说的过关，就是把农业基础的底子打下来，能够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一个工业国。”^② 这自然是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实现的。

一九六〇年，农业产值比上一年又下降百分之十二点六，其

①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汇报工作时的插话记录，1960年10月29日。

② 周恩来在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各机关17级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10月17日。

中粮食产量比上一年下降百分之十五点六，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更加严重，人民生活水平和身体素质都大幅度下降。面对着农业的严重被动局面，从这年秋季开始，周恩来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和国民经济产生严重困难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指出：“总的说，做计划、搞建设必须有大跃进的速度，又要按比例地发展。只有大跃进的速度与按比例的发展相结合，也就是丰富的革命性与严格的科学性相结合，才能波浪式地、有节奏地持续跃进。否则，就会违反客观规律，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没有大跃进的速度，就会犯保守主义的错误。不按比例发展，就会造成比例失调，丧失平衡，欲速不达。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界限，一切真理都具有严格的科学性。”^①

近两年国民经济产生严重困难的原因，周恩来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自然灾害。他说：“我们在建设当中必须对自然灾害要有足够的估计”，“‘人定胜天’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要辩证地来看这个问题。对这方面有任何忽视都会带来本来可以避免的困难”。其次是缺乏经验。周恩来指出：“现在就需要我们总结经验来掌握这个新的规律，并且有可能比较多地来认识这个规律。我们不可能设想，在我们刚搞大跃进的时候，各种规律都预先能够预见到。”第三个，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其中主要是执行政策不力。^②

联系到农业对国民经济全局的极端重要性，周恩来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就是说农业的发展水平是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因素”，因此，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必须首先考虑到“农业能够提供多少粮食给工业和城市，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劳动力给工业和其他各行各业，农业能为工业提

① 周恩来在副总理汇报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11月16日。

② 周恩来在中央一级下放干部座谈会上的报告记录，1960年12月8日。

供多少原料，农业能为工业提供多大购买力”。他说：

“在我国目前农业机械化水平还非常低的条件下，农业的发展速度不能不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于使用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因而，劳动力在国民经济部门中的配置就成为计划经济中最重要的比例关系之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开展技术革新运动，改善劳动组织，调整生产关系，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但是，更重要的是保证劳动力持续劳动的能力和延续后代再生产的能力。近三年来，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却被忽视了。”^①

为了扭转国民经济的被动局面，周恩来提出，一九六一年口号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由于农业上的问题最先暴露出来，调整农业便成为一九六一年上半年全党最中心的工作。调整农业从哪里入手？首先应该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正如陈云所说：“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②

当时，在农村政策上积累起来的问题已相当严重。一九六〇年初，在庐山会议反右倾的影响下，全国范围内又重新刮起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共产风”：农村人民公社出现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而急于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问题，在发展公社一级经济力量时出现“一平二调”的错误，在分配问题上出现集体积累过多、社员增收过少等问题，在干部作风上出现不实事求是、脱离实际、命令主义等问题，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些问题，已经持续数年，不下大的决心是很难纠正过来的。中共中央曾经针对广东、贵州等地出现的这类问题发出过指

^① 周恩来在副总理汇报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11月16日。

^②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161页。

示要求纠正，但没有得到切实贯彻。七月北戴河会议后，各地实行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事业等，“一平二调”的现象更加严重。这使中共中央感到迫切需要制定出一套切合实际的具体政策，否则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这副担子又落到周恩来肩上。

这年秋天，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又称“十二条”）。这是调整时期一个关系经济工作全局的重要文件，是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以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重要开端。

十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文件。周恩来在会上指出：关于分配问题还是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平行提出来。“我们批评共产风，要从思想上来认识这个问题。”“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所以分配问题必须要把这两句话讲透才能鼓励大家各尽所能。”十一月三日，毛泽东对这封信提出几处重要的修改意见后，请周恩来“召集（李）富春、（谭）震林、（廖）鲁言、（陈）正人、（陈）伯达谈一下，最后酌定”。^①当天，中共中央发出这封《紧急指示信》。

周恩来主持起草的这封《紧急指示信》，在调整农村所有制结构和实现形式方面下了异乎寻常的大决心。它强调：“‘共产风’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必须把当前农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的政策问题，特别是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的一系列的政策问题，向各级党组织讲清楚。”信中提出十二条重大措施，这些措施有着很大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上的批语，1960年11月3日。

- 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
- 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
- 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
- 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 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
- 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
- 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
- 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
- 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
- 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
- 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雷厉风行地要求各地至迟在十二月中旬以前把《紧急指示信》传达到农村中去，使中央的政策直接同群众见面。具体步骤是：先召开有地委、县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经过讨论，弄清思想。周恩来在这里补充写道：“其中要有意识地在同级党委中找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然后再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吸收若干社员代表参加。周恩来在这里又补充写道：“其中也要有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①《紧急指示信》下达后，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农村，向基层干部和农民宣读和讲解，同他们一道为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扭转农村形势而奋斗。

^① 周恩来对中共中央《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的修改稿，1960年11月3日。

这封《紧急指示信》在农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四川省郭县红光公社的社员说：“中央的十二条完全说到我们的心坎上，条条入耳，越听越想听。”雅安多营公社的社员更是赞不绝口：“照这样办，我们睡着了都会笑醒。”^①有的地区的农民听到传达后，“像得了宝似的高兴”，认为“党的政策没有变”，“就像是从农民口中说出的一样”，“完全反映了农民当前的希望和要求”。^②随后，各地普遍开展以反对“共产风”为重点的整风整社运动。

为了进一步研究和分析国内情况，特别是农村情况，确定和落实一九六一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全会前，先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举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形成《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纪要》在《紧急指示信》十二条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若干具体政策：一、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退赔平调账，分两步走。二、社员家庭副业和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是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允许有适当发展。社员自留地占当地每人平均占有耕地的比例，从《紧急指示信》规定的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七。三、对农村集市采取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目前要放手活跃农村集市，不要过多限制。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不久，周恩来率领四百多人的友好代表团出席缅甸独立节十三周年庆祝典礼，并举行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仪式。这是中国同邻国成功地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个实例，起了示范的作用。一月十二日，他从云南回到北京。

第二天，周恩来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毛泽东

① 中共中央转发四川省委关于贯彻《紧急指示信》的简报，1960年11月。

② 人民来信中对《紧急指示信》的反映，1960年12月25日。

在这次会上做了十分重要的讲话，他指出：“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向前发展”，“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毛泽东提出工作中要做到三条：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是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谈起。他要求大家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说：“今年搞个实事求是的一年。当然，不能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不实事求是，也不能这么讲。我们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不摸底了。”^①

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它的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今年搞个实事求是的一年”。周恩来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内容是：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具体议程有：一、听取和讨论邓小平关于上一年十一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情况报告，并通过相应的决议；二、听取和讨论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个方针来编制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交全国人大会议审议；三、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关于十二条紧急指示信发出后各地开展整风整社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等情况的汇报，通过刚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

这次全会特别强调：由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严重的自然

^①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1月13日。

灾害，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要适当缩小基本建设规模，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尽最大努力争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一月十八日，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不要老是搞计划、算账。要搞实际工作，调查研究，去督促，去实践。”“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路线要坚持。”^①这次会议对纠正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又大大发展起来的“左”的错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了重要的作用，是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跨出的重大一步。

“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这个口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八届九中全会结束后，党的工作有了很大转变。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全党广泛开展对各项工作的调查研究，调查的重点集中在农业问题上。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说：在困难面前，我们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主要应求之于自己。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都应该下决心摸清情况，摸几个典型。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才能把工作搞好。还要谦虚谨慎，把情况弄明后再下决心，不能瞎搞。^②二月间，毛泽东在长沙和杭州等地调查时发现群众反映“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就是不具体”^③。他认为需要搞一个比“十二条”更具体、完善的人民公社各级工作条例，把公社各级组织的职权搞清楚。三月上旬，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这个条例的基本

①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61年1月18日。

②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1年1月19日。

③ 毛泽东和王任重谈话记录，1961年3月7日。

内容和“十二条”相同，而又更具体化了。三月四日，周恩来飞抵广州。第二天，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重点是讨论人民公社的体制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会前这段时间内，周恩来正忙于研究基本建设的调整，去东北处理工业生产方面遇到的问题，安排进口粮食，并先后会见阿尔巴尼亚、缅甸、越南、日本、苏联等国经济贸易方面的代表团，没有来得及对农村工作条例进行仔细研究，所以在会上没有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主要汇报了粮食和外贸方面的情况。三月六日，周恩来返回北京。

三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包括华东、中南、西南三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三南”会议。他在会上再一次强调领导干部亲自做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痛切地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①会议还印发了他在一九三〇年所写的《调查工作》(后来把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编者注)。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根据几个调查组汇报的情况，鲜明地提出农村人民公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反对两个平均主义：一个是大队内部各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毛泽东认为：“这两个问题，问题极大，不彻底解决，不可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②也是在三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了包括华北、东北、西北三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三大区工作会议，通常称为“三北”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约参加会议的有关负责人商谈粮食和外贸工作；他还抽空和陈毅、贺龙到工人体育馆观看乒乓球训练，并且会见了即将参加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运动员，鼓励他们“胜而不骄，败

^{①②} 毛泽东在“三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3月13日。

而不馁”，为国争光，打出水平，赛出风格。

三月十四日，周恩来等飞抵广州。十五日至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十九日，周恩来在中南和华北小组会上发言说：这些年对许多问题“所以如此不摸底，不落实，没有留余地、藏一手，除了我们对于复杂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没有根据总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拿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总结经验，提高自己以外，最根本的一个毛病就是没有依照毛主席的要求，深入厂矿农村，进行系统调查、典型试验、反复研究、认真核实，便轻率从事，这就不可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了”。他说：“要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必须从深入下层、深入群众、认真进行调查工作入手。”^① 怎样开展调查研究呢？周恩来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一个困难问题解决了，新的困难问题又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我们下去调查要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它不但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原则。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对群

^①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1961年3月19日。

众的意见领导方面还要加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基础上再加工。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尾巴主义，随着群众跑，就会放弃党的领导。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①

会议期间，周恩来参与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信中写道：

“有了这个条例，公社各级干部和全体社员对于人民公社是什么性质，对于公社各级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就可以有一个统一的、全面的、正确的了解。这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会有一个新的高涨，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就会有一个大的进步，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保证。”^②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会议还讨论了粮食问题。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了粮食的现状。他说：从去年七月到今年六月的粮食年度，全国的收购计划为八百四十亿斤，到现在为止，只收购了七百四十四亿斤，相差的一百亿斤要靠麦收。在今后两个季度，即二、三季度，存在八十亿斤的粮食缺额。

怎样来克服面对的困难呢？周恩来提出应该实行“三包三定政策”，即包产、包购、包销，定产、定购、定销。具体办法是：一、包产以后，超产部分可以全部归大队，但是要允许国家买。周恩来说：“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不仅中央有困难，地方上也有困难。在一般地区我们提出四句话：多产多吃多购；少产少吃

^①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小组会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3月19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1961年3月22日。

照购；灾荒少吃少购；重灾可以由社、县、地、市、省调剂，实行救济免购。有了这四条线，才能争取超产。”二、在目前灾荒基础上进行的包产，一般不能“三年不变”，只能一年一变。当然，个别生产稳定、历年丰产的地区，可以考虑几年不变，但是这只是个别的，由地方上控制。三、地方在“三定”之后出现灾荒，由县、地管小灾，地、省管中灾，省和大区管大灾。中央管两种特大灾荒：一是管三个省到四个省的特大灾荒，二是如果超过三四个省，就要开会，实行“大平调”。“平调”也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过去刮“共产风”是不对的，但是遇到自然灾害以东补西，以丰补歉，东调西调，南调北调，也是不得已，并不是愿意这样做。周恩来强调说：“三定三包”政策“一定要贯彻，否则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稳定农民情绪，增加农业生产”。

为了使粮食早日过关，周恩来提出三条措施：一、在六七年的时间内，还要从各方面来支援农业，大抓经济作物，实行机械化，求得增产。同时还要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口粮水平不能一下增加太多，这是长期奋斗的方针。二、在全国来说，仍要继续提倡节衣缩食，特别是在城市，更要大力提倡。三、在不妨碍生产、而且有利于生产的情况下，要压缩一批城市人口回乡，这项工作应该立即着手准备，而且要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去做。我们希望从今年麦收开始到明年，争取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压缩一千万以上的人口回乡，这对于减少城市的粮食压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会起很好的作用。^① 减人这条措施十分重要，正如陈云所说：“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生产的恢复。”^②

三月二十二日，会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

^①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1年3月21日。

^②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165页。

案)》，并决定将这个草案发给农村党支部和全体社员讨论，征求意见，并在一部分地区选点试行。

在广州期间，周恩来听到陈赓病逝的消息，十分悲痛。陈赓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和上海地下斗争时期的得力助手。长征过草地时，周恩来身患重病，是陈赓和兵站部部长杨立三等用担架抬着他走过来的。周恩来是一个十分重感情的人。一九五五年杨立三病故时，周恩来曾为他抬棺送葬。得到陈赓病逝的消息后，三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经武汉赶回北京。当天，立刻前往设在中山公园的灵堂吊唁，并主持公祭大会。事后，周恩来题写三张“陈赓同志之骨灰”供陈赓的夫人傅涯选用。当邓颖超将三张题字送到傅涯手中时，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这时，由于美国违反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协议，干涉老挝国内和平问题，引起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的不安。四月六日，周恩来离开北京到武汉。在武汉停留期间，修改了中共中央对国家计委党组《关于安排一九六一年基本建设计划的报告》的批转意见和中央转发的《关于调整农村劳动力和精简下放职工问题的报告》。九日，抵达广西凭祥，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黎笋、范文同等就老挝和平问题进行会谈。随后，周恩来又到云南昆明会见缅甸总理吴努，就相同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周恩来在同吴努谈话中指出，我们认为老挝这个战争是打不大的，是美国发动的局部战争。因为那里没有很多空旷的地方，森林太多不好打。如果美国要在那里打局部战争，那么这对美国来说，比朝鲜战争将是更加错误的时间、更加错误的地点和更加错误的战争。只要美国不干涉老挝的内政，老挝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周恩来陪同吴努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参加傣历新年庆祝活动和欢度泼水节。在西双版纳期间，周恩来参观了云南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和国营橡胶园，要求有关人员搞好我国年轻的橡胶种植业，还要求当地干部增强保护环